

「法阿明·马洛夫」

著

Amir Maalou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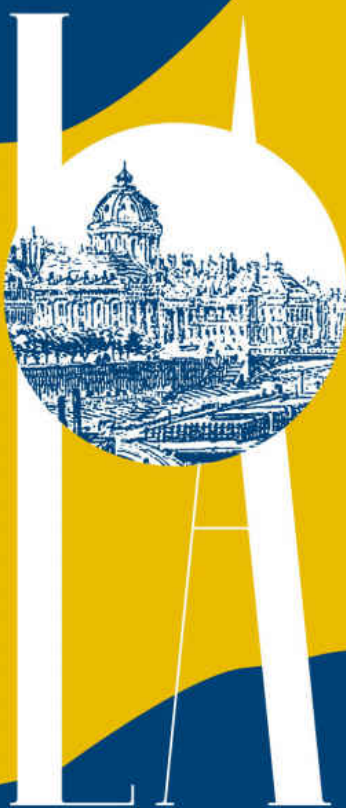
马振骋

译

文匯出版社

塞纳河畔
的一把椅子
法兰西四百年

UN FAUTEUIL



QUATRE SIÈCLES D'HISTOIRE DE FRANCE

LA CHAIR



Amin Maalouf

SUR
LA
SEINE

塞纳河畔
的一把椅子
法兰西四百年

UN FAUTEUIL

QUATRE SIÈCLES D'HISTOIRE DE FRANCE

〔法〕阿明·马洛夫——著

马振骋——译

文匯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

作者：【法】阿明·马洛夫

译者：马振骋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7-01

ISBN：978754962564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这部小书源起于一份内疚。

2011年6月，我双喜临门，一是入选法兰西学院 [\[1\]](#)，二是坐上我大学时代起即敬重有加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那把椅子。

根据学院的礼仪，新院士要对他的前任作一番颂词。我很高兴得到这个机会，可以把这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阅读一遍，有些则是复读，还可对他那我知之甚少的一生作深入了解。这项任务振奋人心，尤其得益于教授的未亡人莫妮克·列维-斯特劳斯的协助，她邀请我和太太到她在勃艮第的利尼罗尔庄园做客，向我慷慨地打开了她杰出丈夫的抽屉，以及她本人内心深藏的记忆。

从我入选法兰西学院到在学院圆顶下举行庄严的入院仪式，这中间相隔十二个月，我对此保持一段美妙的回忆，然而内心也有些许羞愧。

列维-斯特劳斯教授坐的是第二十九号椅子，我浏览了一遍历任名单，发现其中一位在我写第一部著作时给了我宝贵的帮助，那是历史学家约瑟夫·米肖。当时我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书店偶然发现一套古版本《十字军东征史》，共七卷，出版于19世纪初。我在其中摘取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资料，这在其他地方是很难找到的。我打算在入院演讲中向他致敬，尤其他今天完全默默无闻，这样的纪念更加激动人心。

可是我的前任著作不可胜数，使我陷在里面脱不了身；既想介绍他的科学成就、学识历程以及不平凡的一生，同时又想向坐过这

把椅子的另一位俊彦埃内斯特·勒南致敬。勒南晚年选择在黎巴嫩山的一个小村子里落户，写出了他最著名也是争议最多的一部书《耶稣的一生》。我不能撇开主题去谈另一位前任。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原本要谈米肖先生的那个小章节。

我思忖写一篇文章，或者若有机会做一场讲座，尽可能来弥补这个缺陷。于是，我作了一番研究，盼望去发现这位可敬教授的身世，以及通过这部篇幅浩瀚的十字军著作重现他渊博的学识。但是随着阅读的进展，在我面前呈现的则是另一位米肖：一名捣乱分子、鲁莽的冒险家，在大革命时期，因煽动罪坐过牢，关在那时的四国学院，这块地方不久前才改成拘留所，在今天则是……法兰西学院所在地。他从那里被重兵押送到杜伊勒里宫，革命法庭就设在那里，准备给他判个死刑。

我不相信复仇者幽灵，但是我愿意相信文学中有风流客幽灵，他们出没在那些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和想入非非的脑海中。在我站起来宣读我的入院演说时，米肖的幽灵应该也出现在那个圆顶下，因为我原本不认为有必要在文中提到他。他确实在那里，在我身边，而我看不见他。

那时，我下决心投入工作来弥补我的过失，满腔热情去钻研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追随他曲折多变的人生道路：他的出身、他的旅行、他被选上科学院、最后他的死亡。这样也使我对他的前一任与后一任的院士发生了兴趣。然后，由此及彼，对于在他之前与在他之后、最近四百年间所有坐过同一把椅子的人都发生了兴趣。

我有意要更好了解这些人，他们毕竟与我也有了某种精神上的传承关系，并期盼其中还有人会像米肖给我带来同样的激动。我没有失望，一路上不断地有所发现与感到惊讶，以致很快下决心不再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一支家族的人去完成这份工作。

开始撰写第一位“始祖”时，我承认我虽然坐上这把椅子已经有一段时间，还是连他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书籍分享V信booker 527

[1]. Académie française, 中文译名不统一，本书依习惯译为法兰西学院。该机构由红衣主教黎塞留于1634年成立，次年由路易十三改名为法兰西学院，由此成为正式的学术机构，后纳入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该研究院现有五大学院，余下四大学院分别为：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成立于1663年；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法兰西人文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成立于1795年；法兰西美术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成立于1816年。另，Collège de France，本书译为法兰西公学院，在中文里亦经常与前述机构混淆。——编者注（以下如无说明，均为编者注）

第一任 作家皮埃尔·巴尔丹（Pierre Bardin，约 1595——1635）： 为救学生而溺死的不朽者

最初的占有者在那把椅子上没有坐多久。他1634年3月入选，十四个月后溺死在塞纳河中，这让他得到一个悲惨的美名：第一位死亡的“不朽者”。

皮埃尔·巴尔丹今日已经被遗忘了。就像他那一代的法国作家，几乎无一不是如此。在他们之前几十年，有龙沙、杜·贝莱、拉伯雷或蒙田，这些人的著作我们继续阅读；在他们之后若干年，有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或拉封丹，这些人的著作同样证明是与世长存的。在这两座文学高峰之间，则是一个低谷。

说到最早的四十位院士，他们的书籍没有一部当前还在再版的。有些名字若还叫人想起来，也记不真切。巴尔丹的名字，不管怎样，今日知晓的人也仅是研究17世纪的少数专家而已。他生前享有一定的名声，但是也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位重要作家。虽则他是他那把椅子的第一位座上客，也很难把他算作是这个文社的奠基人。

完全配得上奠基人称号的仅有十二三位，其中第一位是瓦朗坦·孔拉尔。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加尔文教派家庭，作品并无特色，却是个细致的读书人和出众的语法学家。他在1629年想到跟几位朋友在巴黎创立一个文学社团，定期进行聚会。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三

十岁，孔拉尔本人只有二十六岁，最年轻的热尔曼·阿贝尔刚到十九岁，不过他是跟着哥哥才来参加聚会的。

他们个个都很高兴聚集一起，由于住在不同的街区，要找到大家必须满城子去跑，会很辛苦。在那个时代，当然没有法子远距离通知，不是亲自跑腿，就要差人代劳，要相会很不容易。他们商量下来，还不是每周定期定时约在一个预定的地方见面更方便？

就这样，选择了孔拉尔的家作为聚会地点。孔拉尔尚未成家，住在首都中心圣马丁路，跟各家的距离相当。据第一部《法兰西学院史》作者保尔·佩利松的叙述，他们就像平时访友一样海阔天空闲聊：商务、新闻、文艺，等等。“文社里有谁写出一部作品，非常乐意给其他人传阅，其他人又毫不拘束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在讲座后接着就是散步或吃点心……他们至今还谈到学院的初期，犹如一个黄金时代，这时候交往不声不响，不虚张声势，除友谊之外没有其他法则约束，他们共同享受精神社会和理智生活中最温馨与最令人陶醉的部分。”

他们相互承诺，对谁都不提起他们的文艺小圈子，这份协定保持了三四年。可是有一天，其中一位诗人克洛德·德·马勒维尔一时大意了——要说是幸还是不幸，那要看各人立场。当他与一位名叫尼古拉·法雷的作家一起时，有一句话提到了这些聚会。法雷爱热闹，甚至可以说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他那个世纪的许多文人——其中有尼古拉·布瓦洛——写了几篇讽刺诗，就把他的姓“法雷”（Faret）跟酒馆“卡巴莱”（cabaret）押韵；他出入这些场所在当时无人不晓。这两位诗人是不是在这一类地方相遇的呢？他们两人是不是还有点喝醉了呢？历史上没有记载。总之那一天，两人的舌头都守不住了，马勒维尔向对方透露他们有个小圈子，谈论些什么，平时做些什么。

法雷不久前出版了一部书，书名叫《正派人》，愿意参加他们的聚会，向他们介绍这部书。孔拉尔与他的一伙觉得有义务邀请他。他们听完他的叙述，提出几条看法，法雷觉得很有道理。他对这次相见很高兴，轮到他对他的一位朋友说起这事。而他的朋友德·布瓦罗贝尔神父，也表示出想受到邀请的意向。

神父交游广阔，在巴黎沙龙里是个大红人，好像还拥有巨大家财。大多数“密谋者”都认识他，对他有好感；他们直到那时不愿意他来入会，只因为他是红衣主教黎塞留身边的熟人，如果他们邀请他参加聚会，他们就进入了统治法国那个人的视野。现在布瓦罗贝尔既然知道他们这个圈子的存在，那就再也不可能把他拒之门外了。

于是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神父很欣赏他刚听说的这些人交流切磋的雅事，忙不迭地把这一切告诉了红衣主教。红衣主教立刻派他去问——佩利松对我们说——这些人是否愿意成立一个团体，在官方的名义下定期集会。布瓦罗贝尔先生回答说，他认为这项建议会被欣然接受。红衣主教命令他去办，也向这些先生提出将把他们的文社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还颁给他们正式证书；对他们每个人在任何场合都予以格外的眷顾。

然而出乎黎塞留信使的预料，孔拉尔和他的朋友们对这条建议并不起劲。他们一个接一个轮流发言，说他们宁可像从前那样，在朋友之间非正式聚会。

他们正在讨论怎样采取最适当的方式回绝，而又不得罪这位大人物，这时候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人物、文学评论家让·沙普兰，凭其权威插进来发言，说他们没有走对方向。他向他们保证说，他跟

大家一样，对参加目前的聚会感到莫大的快乐，他也宁可这些聚会依然静悄悄地继续举行，红衣主教对他们不闻不问；但是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坚持无疑是发疯：“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那个大人物，不是个会随便放弃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听到“不”以后会让人任意脱身的人；我们如果拒绝他的建议，他发起脾气来绝不会放过我们，直到我们屈服为止。他还向他们提到，法律规定没有君王的批准禁止一切集会；“只要他想干”，红衣主教可以轻易让他们的集会永远禁绝。

这个现实主义的看法最终被大家接受，据佩利松说，“决定请布瓦罗贝尔先生去向红衣主教大人谦逊道谢，感谢他对他们的宠幸，向他保证说，他们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的奢望，红衣主教阁下的计划令他们受宠若惊，他们大家坚决完成他的愿望。红衣主教得到这样的回答也心满意足，命令布瓦罗贝尔先生对他们说，他们依然像以往那样集会，根据他们的判断适当增加文社人员，也由他们内部讨论会提出在未来的发展中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与制定什么样的章程。”这一切发生在1634年年初。

“这个学院最初是这样成立的，”过了一个世纪，伏尔泰在他那次庄严的入院仪式中这样说，“它的初心要比黎塞留主教所确立的更加高贵。它是在友谊中间成长的。几个人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热爱艺术而联系在一起，不为沽名钓誉；他们没有他们的继承者那样有才华，然而并不因此而缺少欢乐。”

* * * * *

这个小圈子正在脱胎换骨变成官方机构时，瓦朗坦·孔拉尔年纪已三十开外，决定要娶亲了。他的朋友在此时机被他请到府上，并不仅仅是贺喜，他们还花费许多时间讨论今后的处境。他们必须毫不迟疑埋头工作，完成创办学堂的任务：建立章程；起个名称；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法国思想史：《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法)阿明·马洛夫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96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